

浮沤堂读史

伍立杨

范氏之范式： 道德影响力



宋代名臣范仲淹

一篇宋代名臣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为今人所深情吟颂之、感念之、具有阐述不尽的魅力。

《岳阳楼记》，文章之美，尚在其次，关键要在通过状物写景，达到抒怀的目的。千古传诵的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是何等高旷的胸襟。文章写于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那正是庆历新政黯然退却的时期，范仲淹自己此时就是身在江湖之远，本来很有可能忧谗畏讥，但他没有，反而倒过来安慰朋友。

如此豁达、从容的心态，就是唐宋八大家的韩愈、柳宗元在逆境中也不曾达到。他虽然感慨万千，但不是一味的发牢骚，这和写作者的气度、寄托、胸怀大有关系。

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名家文章，苏轼的特征是行云流水的美文，欧阳修则是雍容自然的道德文章，范仲淹呢，很明显的，他笔下多属论政之文。他的文章和宋代初年那些刻意雕琢、专事藻饰的作家大有区别，他的意图，是要恢复古道，这个古道，不是复古，而是关心民瘼，关心政治的得失，也即政教风化的建立。所以说他的文章是一种论政之文，像他的《上执政书》所言：“不以一心之威而忘天下之忧”，警醒地表达了上书的动机，即以一贯之忧患意识，忧国忧民是第一位，绝非为了个人的身名之计。

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，他的一生主要是从政，曾做到龙图阁直学士，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以及参知政事（最高政务长官之一，相当于副宰相）等重要职位。曾与韩琦并守西陲，上下内外，一致好评，西夏人敬畏有加；又和富弼等同掌朝政，为人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备受舆论称道。他的一些文章所表达的意图，也是庆历新政革除积弊的主导思想。

这篇文章系应他的友人滕子京之请而撰述，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西门，下临洞庭湖，是历代官吏流放到岭南的必经之地。滕子京当年和范仲淹同举进士，在甘肃庆州知州任上被人诬告，于是贬官到了岳阳。在此他也没有颓废消极，而是采取有守有为的态度，居然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，做到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又重新修葺了岳阳楼，铭刻古今诗赋于其上，所以催生了范仲淹的这篇名文。文章状写景物之奇妙，又以天气阴晴变化的明丽与惨淡，来暗喻作者的悲喜，当其笔触由抒情转入言志，水到渠成的熔铸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情怀。至于文章本身，骈散结合，形成全篇错落、跌宕的风姿，诚不愧为千古名篇。

他在江南力主修筑的捍海堰，横跨（南）通州、泰州、楚州，当地百姓将其呼为范公堰，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，杨阜《画像赞》云：“我思范公，水远堤长”。他在青州主政时，平抑粮价，又免支移之苦，以高度的行政智慧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饥荒年月……种种作为，在百姓心中留下丰碑。

范仲淹生前故后，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，刚正廉素的品格，过人的智谋，爱国忧民的信念，健康而丰富的生活情趣，绝非偶然，司马光称其“前不愧于古人，后可师於来哲”，最具代表性。

正如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，构成其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。晚范仲淹一百多年的南宋大臣范成大，和他的同乡前辈范仲淹一样，他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，属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者。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，一以贯之；他曾出使金朝，与金主交涉，他“词气慷慨”，“全节而归”，朝野称道不已。人品学问、道德文章，获得时贤后人的高度评价。他的同年挚友杨万里尝谓：中兴以来，“知政凡二十人，求天下之所谓正臣，如公才一二辈”。

他们同是苏州吴县老乡，范仲淹以政略、军事、文学名于世，范成大则以外交、文学、地理等才略名于世，各有侧重，而其泛爱乐善的胸怀，文武全才的智慧，则颇为相近。同样以毕生的作为，谱写了“先忧后乐”的时代乐章。虽然两范均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，但他们对士林及后世的影响却不尽是行政的资历或威力，而是看不见却恒久存续的道德影响力，即一种本乎儒宗的仁义信念，和开风气之先的道德威望。

前贤的道德情怀，到了现、当代，仍为不少文化人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价值观，也可见其生命力的深远和长久。

大地飞歌

高虹

天真童年里的阶级斗争

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
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
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

诗一般优美的句子，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”，配以梦一般舒缓的曲调，再以天真无邪的童音唱起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一般来说，都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一首幸福童年的赞歌了，和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”一样，和“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，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”一样，和“小鸟在前面带路，春风吹向我们”一样，都是欢乐童年里难忘的歌曲。

但其实它是一首“红歌”，一首用于阶级斗争、阶级教育的歌。因为开头一段优美快乐、悠扬婉转的旋律完毕，随着一个“那时候”的转折，曲调开始变化，变得低沉、哀伤和悲愤起来，这时歌词也终于亮出了控诉旧社会的血泪主题：“妈妈没有土地，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。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，妈妈却穿着破烂的旧衣裳，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，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……”

事实上，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这首歌往往是和另一首《不忘阶级苦》并列同唱的。《不忘阶级苦》早就失传了，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却还被人记着，还被当作童年的回忆谈起，甚至还被翻新了重唱，这在很大程度上，既得益于歌词的开头几句确实如一首独立的小诗，也得益于整首歌的曲调优美抒情。

这首歌发表在1958年《儿童音乐》创刊号上，由作家管桦和作曲家瞿希贤合作。管桦除写了大量文学作品以外，歌词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。而瞿希贤曾坦言，当年她为管桦写的这首歌词谱曲时，纯粹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来完成的。因为她觉得这不像是歌词，更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诗。瞿希贤是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》的曲作者，在那首气势雄伟的歌曲里，“山连着山，海连着海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，歌词有力，与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大相径庭。瞿希贤此时的态度并不是特别积极，只是因为当时管桦不仅是诗人、作家，更是她所供职的原中央乐团创作组的领导，瞿希贤不得违命。她捧着歌词反复研读，寻找灵感——或许正是因为这番工夫，才有了后来的成功。

瞿希贤曾这样说：“真想不到，一次奉命创作，居然会感动那么多人的心灵。”虽然带有那一时代特有的阶级斗争色彩，虽然歌词的主要部分充满了血和恨，但是人们依然把它视为抒情歌曲，在歌声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岁月，他们都倾向于只记前面四句而把后面的血泪控诉忘了，近年，“黑鸭子演唱组”翻唱此曲，也只是反复吟唱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这四句。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：老一辈熟悉此歌的人听起来觉得别扭，怎么就在开头几句打转，怎么不往下唱呢？后面才是此歌的主要内容嘛！而80后、90后的新生代却浑然不觉，他们认为“黑鸭子”版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但已经勾勒出一幅童年的画面了。“后面还有？还有什么？”

哦，不用给他们解释了，后面的内容确实不必再提了，毕竟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了。

轻叩名门

罗文华

燕园行公

按照一些记者的说法，季羡林、金克木、张中行三位老先生，并称“燕园三老”；他们三位，再加上邓广铭先生，则合称“未名四老”。对此，我个人认为，“燕园三老”还算叫得出去，而“未名四老”的称谓却不太恰当，因为它虽然与未名湖有关，但四位先生实则皆住在未名湖北面后湖的朗润园，所以我的北大校友、散文名家卞毓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他们为“朗润园四老”，简称“朗润四老”。这样称呼多少还有些道理。

这几位老先生当中，唯有张中行先生不是北大的教授，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上大学的几年里，几乎没听任何老师和同学提到过“张中行”这三个字。虽然张先生毕业于老北大，他服务了几十年的出版社也坐落在老北大旧址，晚年他又住在新北大校园里，但在1986年秋天他的散文集《负喧琐话》出版之前，却很少有人把他与北大联系在一起。倒是像我这样已经从北大毕业走出校门的人，读到书中所述老北大的衣食住行、奇人异事，不禁勾起对

母校浓烈的眷恋之情，自然也就注意起写书的这位老校友来。《负喧琐话》是张中行先生的成名著作，也是他的代表著作，因此就有人呼他为“负翁”，与这个书名有关，意为“晒太阳的老汉”。但我不愿这样叫他，张先生不仅不欠别人的钱，还经常掏钱援助有困难的朋友，我还是愿意随着他那些晚辈同事的习惯，叫他“行公”吧。

行公比我年长五十六岁，比我早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五十二年，是我的老前辈、老学长，但我是亲眼看着他走上文坛，看着他“暴得大名”的。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？其一，我当编辑在先，他出名在后。其二，我是他的著作较早的知音和评论者之一。其三，在他写作的黄金期，我编发了他很多文章，至今我还保存着他写给我的十几封信。2006年行公终于以九十七岁高龄驾鹤西行了，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，题为《伟大的布衣》，在《天津日报》发表后，读者纷纷来信表扬鼓励，此文还连获2006年度天津市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一等奖、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年赛二等奖。一位喜爱行公作品的博士生看到我的美文，寄来一本行公自传《流年碎影》，让我写上几句话，我便在书的扉页上写出了自己的感悟：“张中行先生的伟大之处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活法。一种活法，比一万本书更有价值。”

行公在我眼里，虽一介寒士而不卑不亢，活得超脱而充实，有滋有味，令人羡慕。他一生清醒，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“疑”，让人不信。北大纪念建校九十周年时约他撰文，他文章的题目就是《怀疑与信仰》。他的《禅外说禅》、《顺生论》，最适合作治当下的心浮气躁。

2007年初秋，我应书画家唐吟方先生之约，到北京参观“古韵今芬”的文人学者书画展，晚餐时与以簪花小楷参展的著名女学者扬之水先生同桌交谈。她告诉我，张中行先生生前曾多次跟她说，他在天津日报社有一个小朋友、好朋友。扬之水本名赵丽雅，曾是《读书》杂志的名编，近年醉心于名物研究并颇有建树，我久仰其名却是初次相见，行公遗言使我们缩短了交往的距离。

前些天听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讲述《易经的奥秘》，我注意到，他两次谈到“孔子没有死”。曾教授动情地说：“你看现在孔子死了没有？你可以说他没有死。你只要心中有他，他就活在你心中。他怎么会死？”“中国人是你活在大家的心中，你就永远不会死。你看，孔子永远没有死过，他活在我们心中。”由是，我可以说：张中行先生也没有死，他活在我们心中。行公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关爱和教诲，早已化为一种相知相识的精神动力。它启益人生的功效，足以超越所有时空界限，“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

燕园行公张中行

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忠言顺耳

“离开你的情人有50种借口，但离开这架飞机却只有8个出口。请在找情人之前，先找到出口”。如果登上新西兰航空公司所属飞机，听到空姐用此开场白来介绍安全知识，就算你刚同情人吻别，恐怕也得认真打量一下出口，毕竟空姐提示既有道理，又具温情；忠言顺耳，如沐春风。

听惯了逆耳忠言，再来感受忠言顺耳，不由人感慨万千。如北京街头“严禁闯红灯越线，违者罚款”，被“司机一滴酒，亲人两行泪”，“不要着急，红灯亮了歇口气”取而代之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即使是忠言，也不必说得逆耳。

神州大地，不良标语一度横行，比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，可是一些地方宣传得十分难听。“谁不实行计划生育，就叫他家破人亡！”、“宁添十座坟，不添一个人”、“宁可超生户倾家荡产，决不可抢生超生一胎”、“上吊给绳，喝药给瓶”、“结贫穷的扎，上致富的环”、“一人结扎，全村光荣；一人超生，全村结扎”……

作为警示语言（标语、口号），义正词严、声色俱厉远远不够，还须考虑到如何诉诸心灵，春风化雨，才会春华秋实。构建和谐社会，首先标语口号要和谐。一旦宣传标语充满霸气、匪气和火药味，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，反会激化群众不满，那就不是以人为本，而是与民为敌了。